

魏晋时期

庄子

阅读史

王亚鸽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时期《庄子》阅读史 / 王亚鸽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112-5779-6

I. ①魏… II. ①王… III. ①道家 ②《庄子》—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B2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4811号

魏晋时期《庄子》阅读史

著 者：王亚鸽 著

责任编辑：庄 宁

责任校对：张 翀

封面设计：三鼎甲

责任印制：曹 净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22197（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135千字 印 张：7

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5779-6

定 价：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魏晋时期是《庄子》阅读史上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庄子》不仅由汉代的一门子学变成当时最重要的玄学文本之一,而且《庄子》的版本以及对《庄子》的解读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这些变化与《庄子》的阅读热又在当时的文学、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文艺理论以及佛教传播等方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本论文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庄子》在魏晋时期的阅读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包括文本流传、阅读模式、读者对象以及阅读效果等。论文内容具体分为六章:

第一章“失落的书”。主要研究《庄子》的版本变迁,通过对史料的追溯与分析,尽可能还原魏晋时期《庄子》的版本流传情况,并在最后探讨郭象的《庄子注》为何成为孤本。

第二章“时代之书”。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以时间为线索,由汉代《庄子》的阅读情况,到曹魏时代的思想解放,再到魏晋之际玄学的“言意之辨”,逐步逼近《庄子》由隐而显的过程。然后重点讨论郭象的《庄子注》为何成为一本时代之书,以及东晋清谈和东晋“格义”佛学中《庄子》的阅读情况。

第三章“另类阅读”。主要研究魏晋时期《庄子》的阅读模式。本章吸收了一些西方阅读史的研究成果,对手抄和诵读。

时代《庄子》的阅读情况进行了特别的关注。由手抄时代文本的流动性和口耳相传中文本的不稳定性，揭示《庄子》版本生成的根本原因，并为读者对当时《庄子》的阅读情况提供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

第四章“文风之变”。主要分析《庄子》的阅读对魏晋时期的文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以文学史上惯用的断代法为参照，从曹魏时期的建安文学，到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竹林文学，到西晋的“二十四友”文人集团，再到东晋的“玄言诗”，最后直至陶渊明，沿着《庄子》阅读盛衰的轨迹追寻其在各个时期的文学中留下的印记。

第五章“士风之变”。主要讨论《庄子》的阅读热在魏晋士人的行为模式上引起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三个大的方面，即新“无为”说、极度的放达和服食行散之风。对当时这些新风尚的讨论，除了反映《庄子》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之大，更在于明确这些新风尚大多出自对《庄子》的误读。

第六章“美的觉醒”。主要探索《庄子》的阅读在魏晋时期的文艺理论中所激起的反响。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论、乐论和画论为重点考察对象，讨论《庄子》的自由精神和艺术气质如何启发了魏晋审美的自觉。

引 论

《庄子》是笔者最喜欢的哲学经典之一，不仅因为其语言形象生动充满想象力，更因为其深刻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认识论。但是在反复阅读时，对于《庄子》文本的构成和郭象的注解，笔者每每有一些疑惑，比如诸多前贤已经论证过的外杂篇的作者问题，还有《天下》篇的定位和旨归问题。尽管相关的论文也不少，说得也令人信服，但背后仍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篇目为何被编在这样的位置？这些篇目使得《天下》篇作为“序论”的说法并不那么可信，因为《天下》篇所评价的一些学派并没有出现在这些篇目中。

我们知道，流传至今的三十三篇《庄子》是经过西晋郭象编辑整理并做过注解的，而在郭象生活的年代，《庄子》的通行版本是五十二篇。那么郭象为什么删掉了其他篇目，而被保留下来的篇目又何以呈现出今天这样的编排方式呢？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走进《庄子》在魏晋时期的阅读史。

魏晋时期在《庄子》的阅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庄子》在这一时期从汉代的一门子学成为显学，并深刻地影响了思想、文学、社会风尚以及佛教传播等领域。其次《庄子》的

文本也从此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五十二篇的全本渐渐淡出主流视线，乃至最后完全消失，而三十三篇的郭象本则成为后世流传的孤本。

那么，究竟如何展开对《庄子》的阅读研究呢？笔者从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中获得了启发。阅读研究本身就是传播学的一个领域，因此其方法完全可以用来指导阅读研究。而传播学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就是所谓的“5W”模式，即从传播者、文本、读者、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这五个方面进行研究，此模式适用于报纸、广播、电视和书籍阅读等各个传播领域。依此方法，本论文对《庄子》阅读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定位，具体包括对《庄子》版本变迁的探讨、对手抄和诵读这种阅读模式的研究、对《庄子》由隐而显的传播过程的追溯以及《庄子》对当时的文学、美学、佛学以及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等所产生的影响。

除了追溯《庄子》文本生成的过程和《庄子》在魏晋时期诸多领域留下的回声，《庄子》的阅读研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再现那些已被遗忘的阅读状况和已经消失的阅读习惯，揭示出已为今人所陌生的阅读模式，而这些阅读模式正是构成文本独特的原始情貌的关键，因此也就是理解文本的关键。这对于我们阅读和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庄子》非常重要。

目前国内有关《庄子》的研究著作堪称汗牛充栋，但绝大部分是关于《庄子》文本本身的研究，即“庄子学”或“庄学”，主要集中于对现有的郭象本《庄子》内容上的解读。方勇教授的庄学巨著《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其“魏晋南北朝庄子学”一章，粗略地勾勒了庄学在魏晋时期的发展轨迹，但其重点仍是时人对《庄子》内容的解读。专门对《庄子》在魏晋时期

的阅读状况进行研究者很少,且基本上都是只是泛论而没有深入,更没有真正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庄子》的阅读情况进行研究的。学者马晓乐的论文《魏晋时期〈庄子〉的传播与接受》(《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具有一定的传播学视角,但作为一篇期刊论文,可能由于篇幅所限,因此未能真正采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而只是对各个时期的阅读影响泛泛而谈,而且也没有具体到《庄子》的文本研究、阅读和传播方式等。学者尚永亮的《魏晋名士的注〈庄〉解〈庄〉及其误读》一文(《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01期),侧重于对向秀和郭象以及支遁的《庄子注》的义理比较,属于《庄子》阅读研究中的一小部分。另外,还有学者刘红红的《从三部传统目录学著作看古代〈庄子〉的传播与接受》(《图书馆论坛》,2008年04期),主要通过对比《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中所收录的《庄子》研究著作的数量,研究《庄子》在传播史上的盛衰,其重点也不是阅读研究。

海外有关《庄子》的研究著作也很多,但和国内一样,绝大多数是“庄学”著作,只是较之国内研究,海外的研究更倾向于对细节的关注,以及将《庄子》的思想与西方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庄子》进行阅读研究的论著极少,笔者目前仅看到数本相关专著,比如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 Yu Shiyi 老师的《唐代〈庄子〉的阅读研究》(Reading the Chuang-tzu in the T'ang Dynasty),然而他集中于对成玄英注的讨论。其他的论著类似。

尽管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庄子》的专门研究很少,但关于阅读史研究的论著却很多,而这些论著从方法论上让笔者受益匪浅

浅。比如学者许欢的《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图书与情报》, 2010年第5期), 学者张仲民的《从书籍史到阅读史: 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的若干思考》(《史林》, 2007年10月), 以及王余光《西方阅读史研究述评与中国阅读史研究新进展》(《高校图书馆工作》, 2005年第2期)。

作为阅读史、传播学的理论发源地, 西方国家的阅读研究更全面深入, 尤其是对阅读模式的研究, 比如朗读和手抄文化的研究等, 都让笔者获得诸多灵感。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加拿大学者 Alberto Manguel 的阅读史专著 *A history of Reading*, (USA: Penguin Group, 1997), 还有美国学者 Robert Darnton 的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等, 这两位学者作为西方阅读史研究的权威人物, 其对阅读研究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但国外学者的研究均未涉及《庄子》的阅读。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 以传播学的方法对《庄子》在魏晋时期的阅读情况加以研究, 不仅关注魏晋时人对《庄子》的解读, 更将重点放在了《庄子》文本的变迁和流传、手抄和诵读的阅读模式以及阅读效果上。具体在阅读效果的研究方面, 通过对魏晋时期主要文人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专著的文本细读, 具体深入地展现出《庄子》在魏晋时期比较全面的阅读场景。而对这种阅读场景的揭示, 不但具有认识过去的历史意义, 更有理解现在的现实意义。

目 录

前 言	01
引 论	03
第一章 失落的书：魏晋时代的《庄子》	01
战国时代的《庄子》	02
秦汉年间的《庄子》	04
何谓《庄子》大全本	07
魏晋之际的《庄子》	09
郭象本《庄子》	11
孤本的产生	14
书之厄	16
结语：时乎，命乎	19
第二章 时代之书：《庄子》如何在魏晋大盛	21
魏晋以前《庄子》阅读小史	21

魏晋时期《庄子》阅读史

启蒙时代的曙光：曹魏政权下的思想解放	31
言意之辨：一把开启魏晋玄学的钥匙	37
时代之书：郭象的《庄子注》	43
东晋清谈中的《庄子》	52
东晋“格义佛学”与《庄子》	57
第三章 另类阅读：手抄和诵读时代的《庄子》	65
魏晋时期的手抄文化	65
魏晋时期的书籍流通	73
口耳相传：魏晋时期《庄子》的传播方式	80
第四章 文风之变：从魏晋文学看《庄子》的阅读	93
建安风骨中《庄子》的影子	94
人间世与逍遥游	103
西晋文学与金谷宴集	114
东晋玄言诗与兰亭雅集	120
“田园诗人”陶渊明	128
第五章 士风之变：《庄子》与魏晋时期的新风尚	133
于此岸抵达彼岸	133
放达为非道？	149
疯狂的时尚	158

第六章 美的觉醒：魏晋文艺理论中的《庄子》·····	167
文论中的《庄子》·····	167
乐论中的《庄子》·····	179
画论中的《庄子》·····	189
结 语·····	199
主要参考书目·····	201

第一章 失落的书：魏晋时代的《庄子》

什么是《庄子》？对于当今许多读者，这个问题会显得很突兀，难道不是共三十三篇六万多字的那本书吗？因为在著作权意识已十分明确、书籍保存已非常稳定的今天，一本书出版了，这个版本就永远成为独一无二的版本。而在漫长的手抄文化时代，一本书可能会在抄写和流传过程中，不断变化甚至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很多读者可能没有想到，除了三十三篇之外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庄子》，因为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只是这样的《庄子》，即经过西晋的郭象（约 252—312）整理并作注的《庄子》。然而，除了三十三篇的郭象本之外，还存在多个《庄子》版本。事实上，从庄子（约前 369—前 286）完成内七篇之后，所谓的“《庄子》”就一直在变化之中。如今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即郭象版的《庄子》，实则是由庄子本人以及庄子后学共同编撰的结果，其中包括篇章的增删和内、外、杂篇内容的调整以及文句措辞的编辑等。

那么庄子本人到底写了多少篇，而庄子后学又补充了多少篇，以及战国之后编校书籍的人对庄子又做过哪些改变等等，这些问题使我们手中的《庄子》显得十分可疑。我们所谈的《庄子》，可能与秦汉时人的《庄子》并不相同，与魏晋时人的《庄子》也不

相同，更与战国时代的《庄子》大不相同。

战国时代的《庄子》

由于文献不足，我们已无法得知战国时代《庄子》的全貌，但是从先秦子书对它的引用以及荀子等对庄子的评价中，仍可以窥见其一鳞半爪。在先秦子书中，明引或暗用《庄子》最多的就是《荀子》。由于引用之多不胜枚举，在此仅就荀子对庄子的批评展开分析，以见战国时代的《庄子》别有他本。

比庄子小大概五十岁的荀子（约前 313—前 238），可能是史上第一位抨击庄子的学者，他在《荀子·解蔽》中批评庄子学说为“蔽于天而不知人”。如果依照今本《庄子》，这一批评便十分费解。虽然内七篇多谈天道而不涉及具体的人事，但外、杂篇中有很多地方都谈到了人道，并且谈到了人道如何与天道相应，读起来但觉庄子不仅知人，而且深得“天人合一”之道。例如，《天道》篇伊始便说：

“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

这句话不但谈到人道，而且很有调和儒、道思想的色彩，以至于学者张远山在《庄子三大版本及其异同》一文中称《天道》篇为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公元前 179—前 122）所增补，意在融合儒、道、名、法各家思想。

不管《天道》篇是否为刘安所增补，在荀子所批评的《庄子》中，肯定没有这一篇。我们不妨再看《在宥》篇中的一段话：

“不明于天者，不纯于德；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

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
天道之与人道，相去远矣。”

尽管张远山亦认为《在宥》篇为刘安所增补，增补的用意与《天道》一样，即为调和儒、道、名、法各派思想。笔者认为，《在宥》、《天道》二篇，思想倾向有所不同，《在宥》篇旨在谈恬淡无为之道，似乎是对老子学说的演绎。不论究竟是不是刘安所作，这二篇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明确而深刻地谈到天道与人道。可以推断，荀子所看到的《庄子》中没有此二篇，因此大体可以肯定荀子之后有人对《庄子》进行了增补。

略在荀子之后的吕不韦（约公元前 290—前 235），招集其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于公元前 239 年撰成的《吕氏春秋》，亦大量引用《庄子》之文。其中《必己》一篇几乎全部抄自《庄子》，然而有的地方文句却与今本《庄子》（即郭象本）大为不同。例如下面一段：

“张毅好恭，门间帷薄聚居众无不趋，與隶圻媾小童无不敬，以定其身，不终其寿，内热而死。单豹好术，离俗弃尘，不食谷实，不衣芮温，身处山林岩堀，以全其生，不尽其年，而虎食之。”⁰¹

我们可将其与今本《庄子》中此段文字作一比较：

“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悬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

01 《四部备要·吕氏春秋·必己》，中华书局，1989年，第97页。

内而虎食其外，穀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这段文字出自今本《庄子·达生》，是田开支对周威公谈养生之道时所举的例子，以明何谓“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虽然不像今人一字一句如实引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古人引书但引大意，可以完全以自己的语言出之，但对比《吕氏春秋·必已》篇所引的“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一段，与“庄子行於山中，见木甚美，长大，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一段，却与今本《庄子》文字几乎相同。我们似乎可以推测，今本《庄子》中此段文字，为吕不韦及其门客或他们之后的庄子学派所改写。

究竟是吕不韦及其门客在引用时改写的呢？还是秦汉人或西晋初年某人所改写？抑或是郭象改写的？《达生》篇的作者到底是谁？初本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虽然已经无法确知，然而还是可以从《吕氏春秋》的引文推知战国时代《庄子》版本的不同。

秦汉年间的《庄子》

除了先秦子书中引用的《庄子》异文，还有一些异文保存在后来的类书之中。例如唐代的《艺文类聚》中所记载的下面这段文字：

“梁君出猎，见白鴈群，梁君下车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谓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骇。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孙袭下车抚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袭不与其君，而顾与他人，何也？’公孙袭对曰：‘昔齐景

公之时，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杀人，褒谓主君言，无异於虎狼矣。’梁君援其手，与上车，归入庙门，呼万岁。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猎皆得禽兽，吾猎得善言而归。’”⁰¹

《艺文类聚》称此段文字引自《庄子》。在《吕氏春秋》成书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40年出生的陆贾（卒于公元前170年），其著作《新语》的新序杂事第二文中，亦有此一段，但未称其出自《庄子》。《太平御览》卷第四五七和《困学纪闻》卷十亦有此段，并皆称出自《庄子》。而《太平御览》第三九〇卷引《说苑》亦有此文，但《说苑》为西汉末年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曾领校秘书时，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而编辑的一部先秦至西汉初年的逸闻轶事集。因此，《说苑》中纵有此段文字，亦极有可能出自《庄子》。

如今我们再来看这段文字，很容易联想到《国语》、《晏子春秋》、《战国策》等书，且颇有儒家明君贤臣的味道。不难理解刘向为什么引用了庄子的这段话，因为《说苑》的编定意旨之一就是借这些史料故事说明儒家思想和伦理观点的。但如果秦汉之前的《庄子》中有此一段，则不知其位于何处作何用意。如果以

01 （唐）欧阳询主编《艺文类聚卷六十六·田猎》，中华书局，1965年，第1172页。

内七篇作为庄子学说的灵魂准则，那么这段与今本《庄子》学说风格迥异的文字，可以推断是秦汉年间试图调和百家学说的某些人杂糅进去的。

而在调和百家的人中，有一个人至关重要，他就是西汉初年的淮南王刘安（约公元前179—前122）。刘安作为才华出众的诸侯王，虽然在政治上乏善可陈，却留下了集先秦学术之大成的《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一样，《淮南子》亦为刘安与他的门客所撰，内容也是泛采众书，非常博杂。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以故入杂家。尽管外篇已佚，然今存的二十一篇大多为以道家思想为主的内篇，我们依然不难看出书中有糅合道、儒、墨、名、法等家思想的倾向。

上文所引《吕氏春秋》中的“张毅好恭”一段，在《淮南子·人间训》亦有类似记载：

“单豹倍世离俗，岩居谷饮，不衣丝麻，不食五谷，行年七十，犹有童子之颜色，卒而遇饥虎，杀而食之。张毅好恭，过宫室廊庙必趋，见门闾聚众必下，冢徒马圉，皆与伉礼，然不终其寿，内热而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内。故直意适情，则坚强贼之；以身役物，则阴阳食之。此皆载务而戏乎其调者也。”⁰¹

与《吕氏春秋》的引文相比，《淮南子》的阐发更多更深，

01 《四部备要·淮南子·人间训》，中华书局，1989年，第167至168页。